

# 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认同的变化

王付兵

**摘 要：**二战后，迫于国际国内大背景的压力，东南亚大多数华侨不得不自身调整，开始了自身身份认同的激烈变化。这主要体现在民族（当地）认同、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等方面。其中，民族（当地）认同是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认同的最根本变化。

**关键词：**东南亚； 华侨华人； 认同

**中图分类号：**K33；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1）04-0055-12

二战后，伴随着东南亚各国先后摆脱殖民统治纷纷独立，东南亚具有进步性质的民族主义在反帝、反殖斗争中，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强化。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陆的建立和发展，以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太地区无可避免地成为冷战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东南亚的华侨社会既涉及国共斗争和中国政治，不可避免地也成为冷战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视华侨为中共的“第五纵队”。它们的政策是进一步阻止华侨参加东南亚的建国运动，并在东南亚国家和华侨社会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的活动。正是处于这样险恶的内外环境和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东南亚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限制或排斥华侨的政策。东南亚华侨迫于国际国内大背景的压力下，不得不自身调整，开始了自身身份认同的激烈转变。

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认同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民族（当地）认同（National identity）、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与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等三方面。

---

收稿日期：2001 - 07 - 05

作者简介：王付兵（1971 - ），男，福建漳平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认同有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上，认同是人类行为与动力的持久源泉，它坚定了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又从他们与他人的关系中，派生出生命的意义。在宏观层面上，认同是一个更深的个人意义的代码，它将个人与最一般层面的社会意义相联系。本文所论的“认同”乃指宏观层面意义上的认同。认同问题研究，肇始于二战后，现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参阅张汝伦：《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载《哲学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17、24 页。

王赓武教授对这三种认同概念有较详尽的论述，可参阅 Wang Gungwu,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Jenifer W.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ed.),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21.

## 一、民族（当地）认同

民族（当地）认同，实质上就是对当地国的政治认同。它是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认同的最根本变化。

二战前，侨居东南亚的华侨主要是来自广东、福建、广西等省“破产的贫苦农民，他们世代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且不识字；在家乡的时候，他们不一定有（或者说，需要有）‘中国人’、‘祖国’概念。”<sup>[1]</sup>到外地，也只知道家乡的、乡土的、帮派的概念。省籍的概念对他们来说不是很重要，至于“中国人”、“中国公民”、“中华民族”、“祖国”等这些广泛和抽象的概念就更别提了。到海外之后，他们才真正地意识到，他们是福建人、客家人、海南人、潮州人……的意义。而由于离乡背井，到的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荷兰等国的殖民地，他们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是华侨（在海外谋生客居的中国人），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华侨第一次有“祖国”、“中国”的认同意识，这固然离不开 19 世纪末以来清政府、立宪派及革命派对华侨的宣传和争取。因为这些宣传与争取，一方面使华侨“政治化和意识化”<sup>[2]</sup>；另一方面，亦加强了华侨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加强其“中国人”、“侨民”和“中国”的意识。因此至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的形势下，华侨一方面同仇敌忾，一致抗日；另一方面，由于华侨社会内部交往的密切，他们开始意识到广东人、福建人、客家人、广西人、海南人等统统都是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

二战后，中国政府“为了国外华侨的长远利益，便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了有利于处理我国和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sup>[3]</sup>，主动放弃了双重国籍原则。早在 1955 年 4 月，中国政府就率先同印尼政府签订了关于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其中明确规定：“缔约国双方同意凡属同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籍的人都应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籍中选择一种国籍”<sup>[4]</sup>。1959 年 6 月和 10 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在缅甸驻华大使和前新加坡首席部长戴维·马歇尔谈话中，也重申了放弃双重国籍的原则。随后，在与菲、泰、马建交及与印尼复交时，中国又进一步重申了这种立场。1980 年中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三条亦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拥有双重国籍”。上述因素加上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东南亚国家在外侨入籍上由多重限制趋向放松，势必造成东南亚大多数华侨在民族（当地）认同上发生了最根本的变化，这也就是为人所知的由原先的“叶落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的这种认同观念的变化。<sup>[5]</sup>

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民族（当地）认同主要体现在二方面：一是国籍的改变；二是参政意识的加强。

### （一）国籍的改变

印尼自 1945 年 8 月独立以来，在国籍政策上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变化。然而，华侨真

---

三个时期指被动制国籍政策时期（1945 - 1954 年）、主动制国籍政策时期（1954 - 1980 年）和欢迎华侨入籍时期（1980 年以后）。

正大多数认同于侨居国印尼籍却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1980 年,苏哈托政府鉴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及其某种政治的需要,采取了放宽华侨入籍的政策。其中规定:居住在印尼的外侨,如符合 1958 年国籍法第 5 条所规定的申请归化者,年满 18 岁,在印尼出生,连续在印尼居住 5 年和有固定职业者,出示证件并交 3000 盾费用,以审核无疑问即可加入印尼籍。至于原来是中国国籍的申请人,只要附上由本人签名的放弃原来国籍的声明即可。<sup>[6]</sup>

中印(尼)断交后,印尼的环境日益不利于华侨生存。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选择印尼国籍,落地生根,作为当地国公民,才有利于本人及其后代在印尼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他们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回到中国的难侨生活状况中了解到,即使回中国去也无法适应那里的生活。中国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出现的政策失误,也使不少原拟回国的华侨放弃初衷,希望加入印尼国籍。据统计,到 80 年代初,630 万印尼华侨华人中,仍保持华侨身份的只有 30 万,约占 5%。<sup>[7]</sup>

马来亚在 1957 年宣布独立时,其制定的《宪法》中规定,只有在当地出生者才能获得公民权。<sup>[8]</sup>马华公会与广大华人团体、领袖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于使 100 万华人获得了马来亚国籍和公民权资格。以后,随着获得当地国籍和公民权资格人数的增加(含自然增长及归化),至 90 年代,总数 565 万华人华侨人口中,保留华侨身份的仅占 5%,<sup>[9]</sup>华人人口总数已达 536.7 万,成为马来西亚的第二民族。这表明马来西亚华侨在国籍改变方面已多数转为认同于当地国。

新加坡于 1965 年脱离马来西亚取得独立时,绝大部分华人已成为新加坡公民。至 1993 年,据统计,华人有 228 万,占全国总人口 300 万的 76%;马来人居第二位,占全国总人口的 15.1%;印度人第三,占全国总人口的 6.5%,其他族群占 6.4%。<sup>[10]</sup>可见华人成为新加坡的主体族群,是 100% 的华族新加坡人。新加坡华人认同于新加坡,是由于新加坡在自治独立中,采取“变移民为新加坡国民,并使之具有新加坡国家意识”<sup>[11]</sup>等星化政策的结果。

二战后,泰国政府基本上实施 1939 年的《国籍法》,但对华侨要求加入泰籍的条件,则较其中规定有所放宽。如 1956 年的《公民权法令》大大放宽了华侨加入泰籍的条件,又保证华侨成为泰国公民后不受《保留泰人职业法令》的限制,遂有较多华侨申请加入泰国籍。据统计,1956 年泰国华侨申请加入泰籍者有 118 人,1957 年为 195 人,<sup>[12]</sup>往后总的趋势是申请入籍的华侨越来越多。1975 年 7 月 1 日中泰建交后,为解决华侨华人国籍问题,泰国国务院于同年 9 月 16 日开会决定进一步放宽入籍的条件。当时的泰国总理克里·巴莫还宣布:“华人申请入籍,泰国政府将尽量给予方便,并放宽入籍手续,入籍后也不必换泰国名字。”<sup>[13]</sup>这便导致大多数华侨为争取长期生存需要而申请加入泰籍,从而完成了认同于泰籍的转向。据 1983 年泰国政府统计,泰国籍华人有 450 万人,华侨仅 28 万人。<sup>[14]</sup>

菲律宾的情形与印尼相类似。1946 至 1974 年间,“菲律宾政府在华人少数民族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的生活与文化方面,菲律宾政府始终如一地没有这方面的政策”。相反地<sup>[15]</sup>,它严格地限制华侨加入菲籍。这与二战后 20 多年菲律宾政府采取排斥、限制华侨的总政策相一致。菲中建交前夕,为避免“华侨会受左派组织利用”,<sup>[16]</sup>马科斯政府决定解

决逾期游客问题,简化入籍手续,以鼓励华侨归化。1975年4月11日,它公布了第370号总统命令书,12月3日发布总统第836号法令,1977年1月5日又公布了修订的第491号总统命令书,为华侨成批加入菲律宾国籍打开方便之门。仅1976-79年三年内,由总统先后批准入籍的就将近3万人(仅指户口,未含眷属)。<sup>[17]</sup>据不完全统计,90年代中期菲华侨华人约有110万人,其中只有1万人保留华侨身份,仅占1%。<sup>[18]</sup>可见,菲律宾绝大多数华侨已完成了国籍上认同于侨居国的转向。

在缅甸,为了一揽子解决独立以来遗留的侨民问题,当局于1982年10月16日正式通过《缅甸民法》,在入籍问题上推行归化政策,按血统将该国公民划分为“公民”、“客籍公民”、“归化公民”3种,并规定了不同的权利,多数华人为了谋生或子女上学只好加入缅籍。该国现有华侨华人90万,大多数已加入缅籍,没有入籍的不到10%,主要是一些年龄较大的华侨。<sup>[19]</sup>

在印支地区,华侨在国籍方面也开始了认同于当地国的转向。越南自革新开放以来就对华人政策作了幅度较大的调整,华人的境况逐渐好转。据越南官方人士介绍,越南现有100多万华人,其中胡志明市有50多万华人,南部平原各省也有华人50多万。<sup>[20]</sup>老挝自1984年以来对华侨华人政策也比较宽松,不歧视华侨华人,华侨加入老挝籍比较容易(不入籍者在购买土地、参军、担任公职、上大学等方面就会受到限制,因而近年入籍者增多)。目前估计老挝华人有1万余人。<sup>[21]</sup>柬埔寨在1979年以后,对华人华侨政策开始放宽。现今该国华人华侨人数已恢复到60年代的水平,大约近40万,而且大部分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sup>[22]</sup>他们中的大多数已加入当地国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二战后至今,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华侨在国籍认同上已完成了从认同中国到认同东南亚各居住国国籍的演变。这种激烈的演变在华侨华人史上是罕见的。

## (二)参政意识的加强

到清朝末年,东南亚便开始出现了政治上的觉醒<sup>[23]</sup>——开始了中国民族主义认同(Chinese nationalism Identity)的历程。辛亥革命的胜利则极大地推动了东南亚华侨社会各阶层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认同。七·七事变后,东南亚华侨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不分帮派、阶层、地域,万众一心投入抗日救国洪流中,从而使中国民族主义认同提升到爱国主义层次。<sup>[24]</sup>

二战结束后,东南亚新兴国家纷纷鼓励或强迫华侨加入当地国籍。短短的50多年间,2000余万具有华侨身份的华侨已选择了居住国国籍,绝大多数华侨已变为当地国公民,东南亚的华侨社会亦已转变为华人社会。这就使得东南亚华人在参政意识方面发生了巨大转变。他们意识到,在成为当地国公民后,要获得生存与发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就

---

文莱政府对华侨入籍严格控制,规定必须连续居住25年的永久居民,经过考试合格才能获得公民权,每年只有一次入籍考试。过去每次只批准几个人入籍,近几年批准入籍人数达到两位数。因此,目前已取得该国国籍的华人仅1万人,只占现有华人华侨总数的20%。详见赵和曼主编:《东南亚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1页。

必须和当地国其他民族一样，积极参政，担任公职，在当地国政界占有一席之地。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甚而印尼等地的华人已经这样做了。

在东南亚诸国中，泰国华人参政意识最强，这与华人被同化的程度最深有关。早在泰国封建时代，华人做高官，居要职者就已不少。二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华人在行使公民权力方面大受限制。1973 年后，泰国大大放松对华人的政治权利限制。如 1975 年 9 月泰国国务院宣布华人入籍后，即可享受公民权，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就为泰籍华人和华侨子女打开了广泛参政的大门。据报道，在泰国 1986 年大选中，“86 位华裔泰籍富豪之家的子弟，由生意人被选为众议员，成为 347 席的众议院中最大的职业团体。”这些泰华“豪门巨富在政治上的投资手笔之大，前所未有。据统计，前年（1986 年）选举，这些豪富花用的选举总经费，竟高达 1 亿 2000 万美元，是泰国选举史上的最高记录”。<sup>[25]</sup>至于地方议员的选举，泰国华人和泰籍华裔当选者也不少。可见，泰国华人在参政意识方面已深深地认同于居住国。

新加坡在自治独立后，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至外交等所有方面成功地贯彻实施星化政策（新加坡化政策），这无疑使当地国华族在参政意识方面完全地认同于新加坡。

在马来西亚，1949 年组建起来的马华公会，一成立就强烈显示了其认同于当地国的态度。它的宗旨主要就是促进马来亚华人的团结与华人认同于马来亚，将“这块哺育与滋养我们的土地造为一个国家，成为我们效忠、热爱与献身的对象”，进而与其它族群建立和谐的友好关系，并与政府合作，对付马共，结束紧急状态。1952 年后它以马来亚最大华人政党的姿态出现，积极参与市政与立法会议的选举。1957 年马来亚独立以来，它长期与巫统、国大党合作组成联盟，参加马来西亚的选举和政府组织活动。此外，从马来西亚的其它华人政党的成立宗旨及其活动均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华人已在参政意识方面完全地认同于当地国了。如 1966 年 3 月成立的民主行动党（DAP）与 1968 年出现的马来西亚人民运动（Gerakan Pakyat Malaysia）等。

菲律宾在马科斯政府大大放宽入籍政策后，当地的华人尤其是新一代的华人在参政意识方面就鲜明地认同于当地国了。这主要是由于热衷于干涉当地华人华侨事务的台湾当局与菲断交后，继之建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当地华人华侨事务采取不愿干涉之政策的缘故。华人在参政意识方面鲜明地认同于当地国，可体现在 1986 年对菲律宾总统的选举上。当时许多华人都积极卷入选科·阿基诺还是选马科斯为总统的激烈争论中。大多数老一代华人认为马科斯“一直以来对华人政策好”，于是倾向于选举他为总统；新一代华人则强烈反对，认为“马科斯在菲的统治对菲律宾没有好处。”<sup>[26]</sup>于是，在当时的菲华社会间出现了老一代华人选举马科斯为总统，新一代华人却选举科·阿基诺为总统的奇异现象。

即使是向来在政治舞台上孤立的印尼华人，也开始了其在参政意识方面认同于当地国的进程。1998 年 5 月种族骚乱结束后，随着党禁的解除，印尼华人为了争取政治地位，保护合法权益，新组成了几个由华人为主导的政党，如印尼同化党、印尼中华改革党、印尼大同党、印尼佛教民主党等。其中成立于 1998 年 6 月 4 日的印尼同化党和同年 6 月 5 日宣告诞生的印尼中华改革党，在建党声明中宣称将致力于“成为华裔发表政见的管道，并通过推进同化工作，消除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华裔）之间的隔阂”或“鼓励华人参政、

争取政治权利，联合其它族裔共同建立和谐的社会”。<sup>[27]</sup>而成立于 1998 年 6 月 1 日的印尼大同党则是被批准参加 1999 年 6 月大选的唯一华人政党。该党表示要为消除各种歧视华人的条例和法令奋斗。印尼华人社会除纷纷组织政党外，还成立各种争取公民权利的团体。譬如，曾为印尼国家争光的羽毛球运动员及其他华裔精英万余人，组成反种族歧视委员会，促请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所有歧视少数族裔的行为。1999 年 4 月 10 日成立的印尼华裔总会，是一个超党派的群众团体，其宗旨是努力取消对华人的歧视政策，实现华人同其他居民最广泛的同化，以民主和自然的方式解决华人问题。

## 二、文化认同

所谓“文化认同”，是指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这种共识与认可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并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思想准则与价值取向。文化认同因文化的不同而各异，它是一个与人类文化发展相伴随的动态概念，是人类文化存在与发展的主要因素。<sup>[28]</sup>东南亚华人文化认同呈现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特点。这是因为：一方面，传统的中华文化是东南亚华人文化认同意识的主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因生活在不同的国度里，东南亚华人产生了国家（当地）认同，这样的一个客观环境同时会影响和制约着他们的文化选择。这同时也就产生了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问题，而在和当地其它民族文化的接触和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变异的问题。<sup>[29]</sup>因此，笔者认为，在分析二战后东南亚华人文化认同问题时，王赓武教授所主张的从两种文化规范入手的分析方法是更为可取的方法。即第一种是华人认为作为华人，他们应该恪守的文化规范（包括学习华文，维持家庭关系，以及对宗教、地域及其它加强华人社会团结的类似组织的支持）；第二种是华人认为是有用并需接受的那些现代文化规范（包括华人社会以外的教育标准和职业结构，还包括非华语的外语技能，甚至还包括宗教皈依所有各种反映异质社会的社会习俗）。<sup>[30]</sup>

### （一）对传统中华文化的较深认同

这种情况发生在华人数较多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内，如新加坡、马来西亚。

新加坡在自治后，伴随星化政策的推行，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传统社会逐步发展为现代工业化社会，华人尤其年轻一代已在文化认同方面完全认同西方的思想文化，由此出现了文化与精神危机。当时的暴力、吸毒、色情、自杀、黑社会组织、家庭解体等诸现象即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为挽救这一危机，新加坡政府制定了明确维护传统文化的策略——推广儒家伦理运动。政府规定自 1984 年始，在中学三、四年级的德育课程中增设儒家伦理课程。此后，它邀请海外一些著名儒学专家，如余英时、杜维明、许倬云等访问新加坡，在政府新闻界的协助下举行专题讨论与演讲，从而促进了儒家伦理推广运动的深入人心，亦保证了运动的健康方向。新加坡社会各界也都很重视对儒家文化的研究和弘扬。华人社团组织如南洋学会、亚洲研究会、中华总商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等，在这一过程中都极为活跃。这些促使新加坡华人从原先的全面认同西方文化，又逐渐转向认同

揉和马来文化、印度文化精华部分的儒家文化。

二战后东南亚华人在文化上仍很大程度认同传统中华文化的另一国家是马来西亚。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政府虽在国籍、参政意识、语言教育等方面促使华人发生了很大的认同转向,但是在传统的中华文化领域方面,它却没有执行同化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占当地国人数第二多的华族在文化认同方面始终不懈地进行捍卫传统中华文化的斗争,另一方面与华人政党马华公会参加国民阵线能对政府的文化政策施加一定影响有关。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一名马来人部长批评舞狮者不算马来亚人时,即遭到华人社会的强烈抗议。华人“变得愈加兴趣于舞狮,至今在许多华人会馆可以很普遍地发现它们拥有舞狮团体”。<sup>[31]</sup>马哈蒂尔上台后,对华族文化执行宽容的政策,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华族更注重对传统的中华文化的认同。发展至今,“在华族组织推动下,华族传统文化节日大放异彩。华人庆祝新年、端午节、中元节等,非但在国、州、县以及大小城乡热烈举行,场面盛况不逊色于根源地中国。”<sup>[32]</sup>应指出的是,目前马来西亚华族在传统的中华文化认同方面主要是认同通俗文化和表演文化,其认同更高层次的传统中华文化仍有很大的距离。

## (二)对主流社会文化的较深认同

这种情况出现于受同化较深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如泰国、印尼、菲律宾等。

泰国在 50 年代以来(銮披汶政府两度实行排华政策例外)长期执行的是温和的同化政策,因而华人在主流社会文化的认同方面泰国化程度较深。这可表现在如下二方面:(1)语言教育方面。限制华文教育政策执行的结果是造成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民办华文学校因学生来源越来越少而停办,就是以往人数达千余名的各层社团主办的民办公立华校亦仅有数百名学生。随着泰国与中国、东南亚其他国家经贸关系的日益扩大,泰国国内对中文人才的需求日增。1992 年 2 月 4 日,泰国政府有条件地对华文教育实行开放政策,华文教育的发展才稍有转机,但仍满足不了泰国经济复苏的需要。(2)出家的宗教风俗方面。这是泰国人宗教活动最具代表性的风俗。华人向来认为出家是看破红尘,是一种奉献,一种牺牲。然而至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这种观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详见表 1 和表 2。

表 1 华人愿意出家的比例

	低教育水准	高教育水准	泰国政府公务员
愿意	36.9%	42.3%	40.7%
不愿意	38.6%	28.3%	14.5%
不确定	24.5%	29.4%	44.8%
合计	100%	100%	100%

表 2 华人赞成儿子、亲人出家的比例

	低教育水准	高教育水准	泰国政府公务员
赞成	66.0%	77.0%	94.3%
反对	34.0%	23.0%	5.7%
合计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Punyodyna,Boonsanong, “ Chinese Thai Differential Assimilation in Bangkok,An Exploratory Study ” ,Cornell Univ. Press,Ithaca,1971,pp.38-40.转引自戎抚天：《泰国华人同化问题研究》，载李亦园、郭振羽主编：《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下），（台北）正中书局 1985 年版，第 18 - 19 页。

根据表 1、表 2，我们可以发现，华人在当时已逐渐愿意接受出家风俗。

在印尼，由于苏哈托政府执行有步骤、有计划在全国范围消灭中华文化的政策（禁止使用华语，禁止华文书刊的进口、发行，禁止进口和流通华语录影（音）带，禁止保留中国文化习俗与提倡改换名字等），结果造成华人尤其年轻一代对中华文化和习俗已逐步或是基本淡忘，广大华人在当地接受的是印尼主体民族的、伊斯兰的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电影、戏剧、音乐、舞蹈、宗教、通婚，以及衣、食、住等生活习俗。华人企业家威廉苏利亚渣雅（谢建隆）的儿子爱德华 苏利亚渣雅的表白即是个典型的例子。他说：“ 我不懂写我的中文名，我觉得我的文化特征，印尼化比华人化更强。我在家乡讲印尼话，习惯吃印尼食物，我的妻子是爪哇人，而我也不会讲中国话。”<sup>[33]</sup>苏哈托下台后，印尼新的领导人取消了一些针对华人的歧视性做法。如哈比比总统执政期间，取消华人身份证的特殊记号，取消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提法，对华文的使用有条件地松动，允许华人组织社团和政党等；瓦希德总统执政以来，撤消 1967 年颁布的限制华人公开庆祝自己节日的第 14 号总统决定书，宣布孔教（儒教）为合法宗教，允许华人取中文名，及撤消禁止华文书刊进口等。上述的变化与进步，对华人开始认同传统中华文化有一定作用。如印尼华人开始成立华人社团如印尼华裔总会、百家协会、新兄弟协会、客属总会等，创办华文报纸（如《和平日报》）。然而，华人要想在传统中华文化认同方面进一步达到马来西亚、新家坡等国那样的层次，恐怕将会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进程。

菲律宾华人是较成功地认同于当地主流社会文化的华人，其程度仅次于泰国华人。独立后至 1974 年间，菲政府虽执行的是限制华侨入籍的政策，也无法不使菲律宾华侨学生在主流社会文化方面日渐认同于当地国。1970 年罗伯特·蒂尔曼（Robert Tilman）对菲律宾学生调查后发现，华侨学生由于与菲律宾人的长期来往，已变得乐意接受菲律宾主流社会的风俗习惯与价值观。其受菲律宾人生活方式影响之深，以致于他们在思维、言行举止与服饰方面变得与菲律宾人相似。<sup>[34]</sup>马科斯政府在放宽华侨入籍后，菲律宾华人在主流社会文化认同方面加速认同于当地国。如菲律宾华人大部分（除 50 岁以上的华人外）都会讲菲律宾语（泰加禄语）。<sup>[35]</sup>应当指出的是，菲律宾华人对传统中华文化之认同现象仍还可见。如该国目前有华文学校 120 多所、华人社团有 2000 多个（包括地缘、业缘、宗亲、



文体、宗教、慈善、洪门组织等形式) 华文日报有 5 家、华文期刊有《新闻》、《桥》、《商总》、《菲律宾周刊》。这些现象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华人对主流社会的文化认同。

### 三、族群认同 (ethnic identity)

王赓武教授认为族群认同是从族群起源的角度来修正文化认同。它强调那种只有通过分离集团通婚的长期体质混合才能缩减的差异。同时,它一般被认为是少数民族集团寻求(或者可以说是争取)其法律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认同。<sup>[36]</sup>

二战后,东南亚华人族群认同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接受同化,参与居住国的政治生活;二是对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当地国主流社会文化的认同;三是与居住国的其他族群通婚越来越多。前二方面的变化上文已论述,在此仅论述第三方面的变化。

东南亚华侨华人与居住国的异族通婚,在东南亚各国早已存在。如明清时期所产生的越南的“明乡”(Minh Huong)、缅甸的“桂家”(Gwe Chia)、泰国的“洛真”(Luk Chin;Lukjin)、马来半岛的峇峇(Baba)、印尼的土生华人(Peranakan)、菲律宾的华菲混血儿(Chinese Mestizo)等,就是华侨与当地入通婚所生的混血子女。这些混血儿在族群认同方面大多已失去了纯华人的特质,生活习惯亦完全当地化。进入 20 世纪后,由于华侨民族运动兴起加上华侨妇女移入人数的增加,华侨与异族通婚随之减少。二战后,伴随着东南亚新兴国家政府限制或排斥华侨政策的执行,大多数华侨为了生存的需要不得不在国籍、政治、文化等方面被迫认同于当地国。其中,与当地国异族通婚现象的增加即是这一形势下的产物。

二战后,华人与居住国异族通婚现象主要发生在泰国、菲律宾。这或许与华人人口在居住国中占比例小、居住国政府对华人实行较温和的同化政策及华人在宗教皈依方面与居住国有相通性等因素有关。

在泰国,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男性华侨华人娶女性泰国人就已很多,但女性华人、华裔嫁给男性泰国人的却很少。60 年代以后尤其是 70 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华人、华裔嫁给男性泰国人的越来越多。这说明在婚姻上泰国华人已完全打破民族界限。发展至今,泰国的华泰两族混血儿已多达 1000 多万人。一些中央、地方的官员很多是华泰混血儿,如前总理川·立派、班汉·西拉巴阿差等。<sup>[37]</sup>泰国内务部官员曾经透露:自 70 年代以来,每年全国申请更换姓名的约有 1 万宗,其中华人更换姓氏者占 90%,且多是青年华人;泰人申请更换姓氏者仅占 10%,因为泰人一般已有泰姓、泰名,故重新申请更换者为数不多。<sup>[38]</sup>

在菲律宾,华人与当地国异族的通婚率亦很高。这可从洪玉华教授在 1995 年作认同问题调查时随机抽查的 510 名受访问者的华人人种起源上看出。详见表 3。

表 3 华人的种起源

	人数	占总抽查人数的百分比
纯血统华人	285	55.9
混血华人	163	32.0
其他	50	9.8
未回答者	12	2.3
合计	510	100

\* 这 510 受访问者的年龄处于 17 - 60 岁之间，他们中的 80%来自学校、公务员机关、校友会、父母协会等单位。在地区来源类别方面，受访问者的 80%主要来自于大马尼拉市，20%来自于其他省份。详见：Teresita Ang See, “ The Ethnic Chinese as Filipinos ”,载“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 ”,edited by Leo Suryadinata,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Singapore,1997,pp.177-179.

从表 3 可看出，混血华人在华人总数中占有的比例已不小，达 1/3 强。此外，棉南老的华人与穆斯林通婚也是当今菲华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sup>[39]</sup>

总之，东南亚华人的族群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华人自我不断地被重塑的过程。最理想的族群认同方式，应当是既接受居住国的身份，同时又能保持原有的族群认同。<sup>[40]</sup>也就是说，融合的方法是最有益的方法。

## 结束语

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认同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当中最根本的变化是民族（当地）认同的变化。华侨华人认同的变化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如华侨华人在东南亚国家居住的时间长短及其在居住国所占的人口比例的大小、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大小及其侨务政策与国际形势等。我国政府在涉侨事务层面，应淡化政治意识，多关心华人华侨在当地国的生存与发展。同时，我们认为，如廖建裕教授指出，东南亚国家的华人是异质群体，它需要我们作更系统的调查与深入的研究。<sup>[41]</sup>

### 参考文献：

- [1] 黄枝连. 东南亚华族社会发展论——探索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208.
- [2] 黄枝连. 东南亚华族社会发展论——探索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203.
- [3] 彭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N]. 人民日报, 1980 - 9 - 14 (1).
- [4] 陈乔之. 华人认同东南亚社会探究[J]. 东南亚研究, 1992, (2): 35.
- [5] 饶尚东. 东南亚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J]. 资料与研究(吉隆坡), 1997, (25): 39-41.

- [6] 汤平山. 印度尼西亚[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230.
- [7] 许肇林. 试析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发展[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2):3.
- [8] 蔡仁龙. 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发展变化试论[A].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情》编辑部. 侨务工作研究论文集(一)[C]. 北京,1990.152.
- [9] 许肇林. 试析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发展[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2):3.
- [10] 李一平,周宁. 新加坡研究[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12.
- [11]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广州华侨研究会. 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89.166.
- [12]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广州华侨研究会. 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89.112.
- [13] 戎抚天. 泰国华人同化问题研究[J]. 台北:民族与华侨研究所学报,1981,(3):161.
- [14] 蔡仁龙. 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发展变化试论[A].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情》编辑部. 侨务工作研究论文集(一)[C]. 北京,1990.153.
- [15] Antonio S Tan Changing Identity among the Philippine Chinese,1949-1984[A]. 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华人变化中的认同”(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A],1985.1.
- [16] 陈烈甫. 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与华裔[M]. 台北:正中书局,1983.248.
- [17]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广州华侨研究会. 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89.248.
- [18] 陈烈甫. 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与华裔[M]. 台北:正中书局,1983.248.
- [19] 赵和曼. 东南亚手册[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607.
- [20] 俞培玲,张加祥. 越南[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90.
- [21] 郝跃骏. 老挝华人现状及社团组织[J]. 东南亚,1992,(1).50.
- [22] 许肇琳,张天枢. 柬埔寨[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221.
- [23] 李 E 威廉斯. 东南亚华人的过去和现在[J]. 南洋资料译丛,1978,(4):7.
- [24] 庄国土. 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1911-1941年间南洋华侨对中国认同的变化载[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110-116.
- [25]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广州华侨研究会. 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89.125.
- [26] Teresita Ang See (洪玉华). Integration and Identity Social Changes in the Post War II Philippine Chinese Community[A]. 郭梁. 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363-364.
- [27] 葛雷士. 印尼华裔政党自救自强[J].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 华侨华人资料报刊剪辑,1998,(4):25-26.
- [28] 郑晓云. 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
- [29] 饶尚东. 东南亚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J]. 资料与研究(吉隆坡),1997,(25):39-41.
- [30] Wang Gungwu.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A]. Jennifer W Cushman, Wang Gungwu.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C]. Hongkong: 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4.
- [31] Tan Chee-Beng. Nation-building and being Chinese in a Southeast Asian State: Malaysian[Z]. 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华人变化中的认同”(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C],1985.14-15.
- [32] 刘文丰. 推广华族文化纳入国家主流[J].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 华侨华人报刊资料剪辑,1997,(5):71.
- [33] 蔡仁龙. 印尼华侨、华人‘认同’的转向[J]. 华人月刊(香港),1993,(4):36.

- 
- [34] Antonio S Tan Changing Identity among the Philippine Chinese, 1949-1984[Z]. 堪培拉: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华人变化中的认同”(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C], 1985.19.
- [35] 温广益. 菲律宾的华侨政策与华侨华人问题——菲律宾学者在中山大学讲学纪要[J]. 华侨与华人, 1990, (1): 76.
- [36] Wang Gungwu.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A]. Jenifer W Cushman, Wang Gungwu.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C]. Hongkong: 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9-11.
- [37] 赵和曼. 东南亚手册[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611.
- [38] 卡节派 巫律博. 泰国政府对于华人之同化政策[N]. 张仲木译. 星暹日报(曼谷), 1987-3-7(11).
- [39] 温广益. 菲律宾的华侨政策与华侨华人问题——菲律宾学者在中山大学讲学纪要[J]. 华侨与华人, 1990, (1): 41.
- [40] 居维宁. 海外华人的种族认同[A]. 陈文寿. 华侨华人新论[C].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7. 90.
- [41] Leo Suryadinata.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Overseas or Southeast Asian?[A]. Leo Suryadinata.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C].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 20.

[责任编辑: 廖大珂]

# Maritime Activities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under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Maritime Exploitation

Gao Weinong

**Abstract:** Nowadays, acute competition for the seas has become the inevitable trends and bas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various countries in expanding their living spaces. Since the UN Convention of Law of the Sea was passed at the UN Third Meeting for Law of the Sea in April 1982,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proclaimed to establish their 200 nautical mil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and accelerated the pace of marine resource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At presen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focus their claims to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on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ine mineral resources, and extend their explorative and exploitative activities beyond their own coastal waters, thus invading and occupying in different degrees the sovereignty of South China Sea which otherwise belongs to China. Our country must also establish a sense of crisis in maritime territories, making a correct assessment of the situation and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reasonably and favorably carry out the researches and actions in maritime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Key words:** the sea; development(exploitation); Southeast Asia

## Changing Identiti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ince World War II

Wang Fubing

**Abstract:** The majorit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have had to change their identities under the pressure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general environments since World War II. It mainly reflects in national (local), cultural and ethnic identities, among which national (local) identity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change.

**Key words:** Southeast Asia; overseas Chinese; identity